

【文学研究】

DOI: 10.14168/j.issn.1672-8572.2015.04.22

《金瓶梅》与《歧路灯》比较研究之我见

周钧韬^①

(深圳市文联, 广东 深圳 518001)

摘要:在对以往发表的《歧路灯》与《金瓶梅》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,在成书方式上,《金瓶梅》是“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”,《歧路灯》是“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”。这是《歧路灯》对《金瓶梅》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。在“对小说写‘性’的认识之比较”部分提出,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,《金瓶梅》写性,是对小说主题、题材的重大开拓;在中国性文化史上,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。《金瓶梅》大写特写性,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。李绿园与《金瓶梅》的对立,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。

关键词:金瓶梅;歧路灯;比较研究;成书方式;性描写;理学;反理学

中图分类号: I207.419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8572(2015)04-0111-05

一、对已有比较研究之比较

《歧路灯》与《金瓶梅》比较研究的文章已发表多篇。看来两书确实有它的可比性。纵观已发表文章,有的比得有道理,有的未必尽然。大体来说,比较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上:一是模仿;二是超越;三是两书作者思想观念的比较。

(一) 模仿

有文指出《歧路灯》模仿了《金瓶梅》。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家庭小说,《歧路灯》亦写了一个家庭,这是题材上的模仿;《金瓶梅》写了一个家庭的盛衰,《歧路灯》亦写了一个家庭的盛衰,这是主题上的模仿;《金瓶梅》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恶霸流氓淫棍形象,《歧路灯》中的主人公谭绍闻是个浪荡公子,均为匪类人物。这是主人公塑造上的模仿。文章还说到两书在家庭陈设、环境布置上的相似与模仿。如此推而广之,凡是在《金瓶梅》之后,写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,写家庭盛衰的家庭小说,以匪类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,都成了对

《金瓶梅》的模仿?此理似乎不通。

模仿,说白了就是抄袭。艺术贵在创新,小说同理。《歧路灯》在这些小说创作的重大问题上都模仿、抄袭《金瓶梅》,《歧路灯》还能成为名著吗?众多学者对《歧路灯》的高度评价,岂不是儿戏。

(二) 《歧路灯》对《金瓶梅》在艺术上的超越

《金瓶梅》在艺术上是一部怪书:从总体上看,它有比较明确的创作目的和指导思想,全书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亦大体一致。全书结构严密,情节发展错落有致,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阔,它不愧为是一部能够展示一个时代整体风貌的,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学巨著。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,《金瓶梅》具有里程碑的地位。它开启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,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渐趋成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。它直接面对现实社会,直面人生,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国社会的种种人情

① 收稿日期:2015-03-10

作者简介:周钧韬(1940—),男,江苏无锡人,研究员,研究方向:《金瓶梅》。

世态。它以塑造人物为主,故事情节则降之从属地位,情节服从人物。小说中的人物,具有复杂的个性化的性格特征,从横向来看由多种性格因素组成,呈现多元的多侧面的状态;从纵向来看呈现多种层次结构。作者还善于将人物的善恶、美丑一起揭示出来,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、美丑相容的特征。《金瓶梅》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,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。它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,写出了心态的动态变化,它善于创造特定的生态环境来烘托、映照人物的心境,将抒情与动态情态描写结合起来,并通过对比、反衬来强化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。

但从某些部分来看,《金瓶梅》无论是在指导思想、思想倾向、艺术风格、人物评价、艺术水准上,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,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,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,文字的水准部分与部分之间,有明显的雅俗、高低之别。书中还有很多人物外貌、病态、哭态,庆宴活动场面的描写,居然无意独创而从他书中借抄了不少陈词滥调。回目拟文似通不通,全然不讲对仗押韵。所题诗词,文字拙劣。这种矛盾现象正好说明,《金瓶梅》是以王世贞的思想为指导,是由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的产物。清焦循《剧说》云:“相传《鸣凤》传奇,弇州门人作,惟‘法场’一折是弇州自填。”传奇《鸣凤记》洋洋四十一出,王世贞只写了一折(出),余者均为门人所作。由于由多人参与写作,而参与写作者的文化素养和阅历的参差不齐,从而造成《金瓶梅》在艺术上的诸多较大的缺陷。此外,日本学者指出,《金瓶梅》有仓促成书的迹象。王世贞创作《金瓶梅》的政治目的是讽刺严嵩父子,因此必须赶在严嵩事败的时候面世(传奇《鸣凤记》的面世即如此)。所以,当初《金瓶梅词话》还是个未定稿,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审读和精心修饰,就开始在极少数文人中流传,问题百出亦就可想而知。正因为问题百出,所以后人对其精心修饰,才有了崇祯本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。而《歧路灯》是李绿园个人的独立创作,由于有丰富的社会阅历,较

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作才能,且有较多的时间,让其精雕细刻。因此整部小说,无论是题材的选取、主题的阐发、情节的铺排、结构谋篇与人物塑造,都显得很齐正、妥贴。《歧路灯》在艺术上超越《金瓶梅》,乃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(三) 两书作者思想观念的比较

有的文章认为,在两书的思想观念方面,《歧路灯》也超越了《金瓶梅》。笔者认为恰恰相反:不是超越而是倒退。《金瓶梅》表达的思想观念是反理学,而《歧路灯》可谓是“独尊理学”。理学思想充斥于全书,以致成为这部书的灵魂所在。这就大大损伤了这部书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。

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学术界对《金瓶梅》与《歧路灯》,在主题、题材、艺术(人物塑造、结构等)、思想观念等方面,作了全面、深入,非常有价值的比较研究,给了笔者以诸多教益、启示。笔者草拟此文,只是在研究界未涉及的以下两个问题上,作些补充而已。

二、关于成书方式的超越和发展

在成书方式上,《歧路灯》对《金瓶梅》有较大的超越和发展。

中国古代小说在成书方式上有三个发展阶段:第一阶段,以《水浒传》为例,其成书方式是艺人集体创作的话本的联缀拼集;第二阶段,以《金瓶梅》为例,其成书方式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(属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形态);第三阶段,以《红楼梦》为例,其成书方式是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。《歧路灯》与《红楼梦》同属第三阶段,其成书方式是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。这显然是对《金瓶梅》成书方式的超越和发展。

为什么说《金瓶梅》成书方式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,属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渡形态?《水浒传》是世代累积型的艺人集体创作,是叙水浒故事的话本、戏曲联缀、拼集、加工而成书的。从《水浒传》到《金瓶梅》是个扬弃的过程,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内在矛盾

运动而进行的自我否定。这个否定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绝对否定，而是既克服又继承、既抛弃又保留的辩证发展过程。

《金瓶梅》对《水浒传》等前人作品的“扬”，即对成书方式的发扬、保留和继承，否定中的肯定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
1. 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。例如：保留了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制；保留了话本小说的引诗入话；保留了很多话本小说的说话人用语：“看官听说”“话分两头”“评话捷说”等等；书中夹杂着大量的诗词、韵文；以曲代言、用快板代言的现象屡见不鲜。这些当然是评话的特征。从形式上看，《金瓶梅》就像话本。难怪不少研究者把它看作是“艺人集体创作”的话本。

2. 保留了从前人创作的话本、戏曲、小说中移植创作素材的传统。在拙著《金瓶梅素材来源》中，笔者用30万的篇幅，考证了250多个金瓶梅素材来源问题，大体是：移植话本的文字20多处；移植戏曲的文字20多处；移植散曲、时调小曲60多处；移植小说（包括《水浒传》《如意君传》《百家公案全传》等）的文字60多处；移植前人诗词10多处；其他性质的文字移植80多处^[1-2]。这些都是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，金瓶梅作者应用得十分娴熟。

《金瓶梅》对《水浒传》等前人作品的“弃”，即对成书方式的抛弃、否定，肯定中的否定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
1. 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创作过渡。《金瓶梅》否定了艺人创作，开启了文人创作的风气之先。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方面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2. 从前人创作的话本、戏曲的联缀、拼集向面向社会撷取创作素材过渡。《金瓶梅》虽然移植了前人作品中的大量文字，但相对于一部百万字的大书而言，仅占百分之十几而已。而其主体故事情节，众多人物形象塑造，都是作者的创作。

《金瓶梅》实现了从“艺人集体创作”向“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”的过渡（所谓“有

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”，是指作品是文人创作，但依然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方式，依靠移植、借抄前人的不少作品而成书）；《歧路灯》（《红楼梦》）则完成了从“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”，向“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”的过渡。

从《金瓶梅》到《歧路灯》，即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，同样是个扬弃的过程。《歧路灯》彻底否定了“艺人集体创作”的话本的形式、体制、规范；彻底否定了用前人作品加以联缀、拼集或移植、借用的创作手法，实现了完全面向社会，从社会中撷取创作素材（而不是从前人的作品中移植、借抄），反映社会、表现社会的创作宗旨、创作规范。在小说艺术美学方面，《歧路灯》继承了《金瓶梅》的优良传统，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。由此可见，《歧路灯》是一部“无所依傍的文人独立创作”的作品，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方式的一大飞跃。

下面我们对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歧路灯》三书的成书方式作一个小结：

1. 就创作主体而言，《水浒传》是艺人集体创作；《金瓶梅》是文人创作；《歧路灯》是文人创作。

2. 就作品的形式特征而言，《水浒传》充分体现了话本的形式特征；《金瓶梅》完全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征；《歧路灯》抛弃了话本的形式特征（还有些残余痕迹）。

3. 就创作素材来源而言，《水浒传》是前人作品的联缀拼集；《金瓶梅》是较大规模地保留对前人作品的移植、借抄，并开始直面社会大量撷取创作素材；《歧路灯》是彻底抛弃对前人作品的移植、借抄，完全直面社会撷取创作素材。

4. 就成书特点而言，《水浒传》是艺人集体创作；《金瓶梅》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（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）；《歧路灯》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。

5. 就作品属性而言，《水浒传》是话本（话本的联缀拼集加工）；《金瓶梅》是拟话本（文人

“模拟话本”的产物,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形态);《歧路灯》基本上是近代型小说。

我们说《歧路灯》是“无所依傍的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”,但不等于说它完美无缺,它仍然有模拟话本创作的痕迹。有研究者指出,《歧路灯》与《型世言》有很深的渊源。《歧路灯》与《型世言》第十五回故事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,且许多细节也相似或相同。《歧路灯》第二十九回与《型世言》第二十七回的故事情节相似,且有的细节描写也颇为相同。因此,可大体推定李绿园以《型世言》第十五回作为《歧路灯》故事的直接渊源或者是蓝本,同时,也借鉴了同书中的其他故事情节,敷衍成了自己的小说^[3]。还有,《歧路灯》写孔慧娘之死的情节与《金瓶梅》写李瓶儿之死的情节,有明显的承袭关系。这种现象并不奇怪:任何新事物对旧事物而言,具有质的区别。但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新的事物是没有的,它依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事物的痕迹。这就是“扬弃”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

三、对小说写“性”的认识之比较

小说能不能写“性”与怎样写“性”,两书作者的思想观念是绝然相反的。李绿园直斥《金瓶梅》为海淫之书,在《歧路灯自序》中说:“若夫《金瓶梅》,海淫之书也。”在第90回中,作者借他人之口说“但坊间小说,如《金瓶梅》,宣淫之书也。……杀却天下少年矣”。李绿园在《歧路灯》中有很多处,或夫子自道,或借人物之口,怀着无比的仇恨抨击《金瓶梅》写性(如第11、19、24、58、90等回),言词之激烈非同寻常。

《金瓶梅》以大量的篇幅写“性”,作者的创作命意是写性,题材、主题都是写性。它是一部性小说。《金瓶梅》大写特写性,到底有没有价值?在常人眼里,性小说是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产物,毫无价值可言。但作为性小说之一的《金瓶梅》,则有非同凡响的重大价值。

《金主亮荒淫》《如意君传》《浪史》《绣榻野史》《闲情别传》等性小说,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

现实而专写性交媾,认识价值、历史价值都谈不上。《金瓶梅》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,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(而不是专写性交媾)。《金瓶梅》开创了与它那个时代相适应的,“以描摹世态人情”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。其突出贡献,就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,以反映、表现这个世俗社会为宗旨,“描写世情,尽其情伪”,揭示这个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。“食、色性也”,食与性是维持人类生存和繁衍的两大基本活动。性、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《金瓶梅》写性、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,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,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、题材的重大开拓。

如果我们从性学角度来考察,它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。其一、由于它写性的全面性、多层次、多角度性,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、各个层面,它几乎涉及到性学、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。因此,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。其二、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,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。《金瓶梅》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,因此它是一部“断代性文化史”,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,具有很高的地位。其三、由于它是小说,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、直观的、形象的。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著作都无法做到的。因此,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、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。当然,《金瓶梅》写性也有其严重缺陷。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时,所持的基本上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,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;对于具有超强性能力的男性,则是崇扬备至。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。写他一天能进行很多次交媾,数日间达上百次;每次交媾达数小时,抽送达数百次……。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手法,将西门庆写成了一个性战神。这种反现实主义手法所塑造的形象,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,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。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,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

显微式的扫描。这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。

从总体上看，《金瓶梅》大写特写性，一方面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所作的全方位揭示，其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可谓大矣；另一方面作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理学思想的强烈的蔑视和否定，难道在思想认识上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？

由此，我们不难理解李绿园对《金瓶梅》写性的仇视。李氏可算是个准理学家，理学是他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行动规范。因此，李氏与《金瓶梅》的对立，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，是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的对立。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。《金瓶梅》要拆天，而李氏要补天，如此而已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周钧韬. 金瓶梅素材来源 [M]. 郑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1.
 [2] 周钧韬.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：第二卷 [M]. 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10.
 [3] 刘铭. 《歧路灯》的故事渊源考 [J].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，2008（4）.

（责任编辑：孙希国）

Comparative Study on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 and *Qi Lu Deng* (歧路灯): A Personal View

ZHOU Jun - tao

(Shenzhen City Literature and Arts Association, Shenzhen 518001, China)

Abstract: Papers of comparative study on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 and *Qi Lu Deng* (歧路灯) were analyzed. It was found that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 was written by a dependent scholar while *Qi Lu Deng* (歧路灯) was written by an independent one. The content relates to sex in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 greatly extend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nd has great recognition and research value in Chinese sex culture history. The much content about sex in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 reflects the writer's contempt and negation toward the Confucianism.

Key words: *Jin Ping Mei* (金瓶梅); *Qi Lu Deng* (歧路灯); comparative study; book - writing method; sexual description; Confucianism; anti - Confucianism